

21世纪高等院校系列规划教材

公共素质课系列

中国传统文化 概观

ZHONGGUO CHUANTONG WENHUA
GAIGUAN

主 编◎谢昭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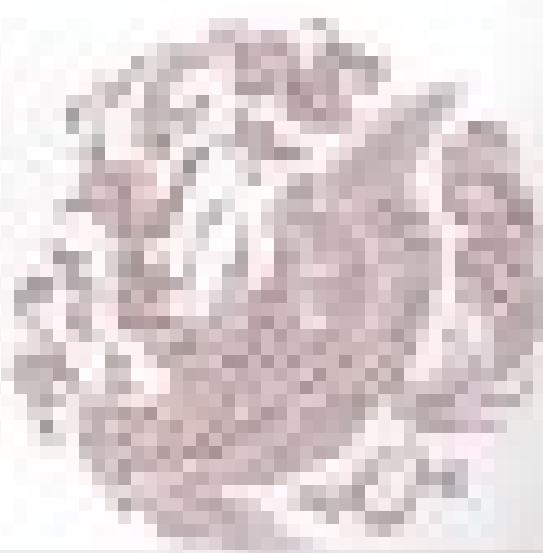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传统文化 概观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



21世纪高等院校系列规划教材

公共素质课系列

中国传统文化概观

ZHONGGUO CHUANTONG WENHUA GAIGUAN

主 编◎谢昭新



1128312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统文化概观 / 谢昭新主编.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303-16635-0

I. ①中… II. ①谢… III. ①中华文化—高等教育—教材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6983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755 58800035
北师大出版社职业教育分社网 <http://zjfs.bnup.com>
电子信箱 zhijiao@bnupg.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84 mm × 260 mm
印张: 11
字数: 252千字
版次: 2013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4.80元

策划编辑: 杜永生	责任编辑: 杜永生
美术编辑: 高霞	装帧设计: 国美嘉誉
责任校对: 李菡	责任印制: 孙文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目 录

绪 论	(1)	第三章 中国传统物质文化	(83)
学习目标	(1)	学习目标	(83)
第一节 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1)	第一节 饮食文化	(83)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		第二节 服饰文化	(100)
环境	(5)	第三节 建筑文化	(110)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流		本章小结	(120)
演进	(11)	理解与思考	(120)
第四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		第四章 中国传统民俗文化	(121)
特征	(17)	学习目标	(121)
本章小结	(21)	第一节 姓名文化	(121)
理解与思考	(21)	第二节 婚姻文化	(124)
第一章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22)	第三节 生肖文化	(129)
学习目标	(22)	第四节 传统节日文化	(131)
第一节 儒家文化	(22)	本章小结	(139)
第二节 道家文化	(27)	理解与思考	(139)
第三节 墨家文化	(32)	第五章 中国传统艺术	(140)
第四节 法家文化	(37)	学习目标	(140)
本章小结	(42)	第一节 中国古代音乐艺术	(140)
理解与思考	(42)	第二节 中国古代绘画艺术	(149)
第二章 中国传统宗教	(43)	第三节 中国古代书法艺术	(157)
学习目标	(43)	第四节 中国传统戏曲艺术	(162)
第一节 原始宗教	(43)	本章小结	(167)
第二节 佛教	(51)	理解与思考	(167)
第三节 道教	(69)	后 记	(168)
本章小结	(82)	参考文献	(169)
理解与思考	(82)		

绪 论

【学习目标】

1. 文化概念的源流演变，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2. 地理环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植根的经济土壤及依赖的社会政治结构。
3. 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流演进：萌发期(远古至西周时期)；定型期(春秋、战国时期)；繁荣期(秦汉至宋明时期)；转化期(明末清初至 1919 年“五四”运动)。
4.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文化，或称中国传统文化，是指氏族社会晚期到“五四”运动以前上下五千年历史中在中国范围内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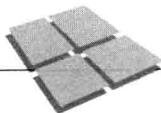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波澜壮阔，汇聚了世世代代，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的卓越智慧与无穷创造力，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方面，展示了中华民族对整个世界所作出的无与伦比的伟大贡献。中国传统文化灿烂辉煌、内容丰富，是世界三大文化体系之一，在历史上曾是东亚文化的中心，而且影响到欧洲，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到西方，对于西方近代文化起到了促进作用。因此，努力探索、发掘和研究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传授民族文化知识，弘扬民族文化精神，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是我们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

▶ 第一节 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文化”概念的源流演化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探索、研究之前，有必要对“文化”这一基本概念作一番考察。从中华典籍中可见，“文化”是中国古已有之的词汇，最早可以追溯到《易·贲卦》的《彖传》。其中有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句，“人文”即指诗书礼乐、人伦道德，“化成”则有教化、化生、变化和造化之意。这里已经蕴含了“文化”的基本含义，即指与武力征服相对峙的文治教化。在以后出现的古代典籍中，“文化”一词的意义，基本上未出上述范围。如汉代刘向《说苑·指武》中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①；晋人束皙《补亡诗》言：“文化内辑，武功外

^① 刘向·说苑·指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420。



悠”^①；南齐王融《〈曲水诗〉·序》中说：“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②等等。总之，古人所说的“文化”包括文治、教化和礼乐典章制度等含义，基本上属于社会上层建筑，与现在所说的“文化”尚有一定的差距。

文化学的奠基人泰勒曾先后为“文化”下过两个定义：

(1)“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艺术、宗教、神话、法律、风俗，以及其他社会现象。”^③

(2)“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④

由泰勒对于文化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他对“文化”也没有一个确切的认识。

20世纪20年代，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开始兴起。“文化”概念的讨论成为学术热点问题。

梁启超认为：“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⑤

梁漱溟认为：“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总括起来。不外三方面：①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宗教、文艺是偏于情感的；哲学、科学是偏于理智的。②社会生活方面，我们对于周围的人——家族、朋友、社会、国家、世界——之间的生活方法都属于社会生活一方面，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是文化。③物质生活方面，如饮食，起居种种享用，人类对于自然界求生存的各种手段是文化。”^⑥后来，他在1941年着笔的《中国文化要义》中又进一步解释：“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俗常以文字、文学、思想、学术、教育、出版等为文化，乃是狭义的。……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⑦梁漱溟将“文化”释为狭义的文化，他所说的“文化之本义”则是广义的文化。而20年代对文化概念的讨论，大体上没有超出上述所说的“狭义的文化”和“广义的文化”这两种定义的范围。比如，文化就是生活；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文化既包括物质的文化又包括精神的文化等等，即属于广义文化。另一意见则认为：文化是指包括文学、美术、音乐、哲学、科学等一类的事；文化即民族精神；文化的真义即精神文化等等，则属于狭义文化。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文化思想领域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讨论热潮，“文化热”影响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乃至物质文明领域。这次的讨论所涉及的文化概念问题，其认识显然比20年代的讨论更加深入、广泛，在文化研究的范围、对象以及文化的本质、内涵等方面取得了诸多共识，其共识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 文选·束皙《补亡诗》。北京：中华书局，1977：272。

② 文选·王融《曲水诗》·序。北京：中华书局，1977：648。

③ 人类早期历史与文化发展之研究。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一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449。

④ [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蔡江浓，编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

⑤ 梁启超。什么是文化，载学灯，1922(12)。

⑥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401。

⑦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北京：学林出版社，1987：1。

(1)文化研究必须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①“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②马克思将人类实践所产生的社会现象概括为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其中，人们的精神生活，人们的意识是随着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物质生产方式对人类生活具有制约作用。

(2)所谓文化，一般都认为是指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毛泽东就曾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新经济的東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③作为人类精神生产的文化是对社会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反映，文化是观念形态的东西。

(3)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含义，应作多方面全面性理解。哲学、宗教、思维方式、道德等属于观念形态的东西，而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美术、书法等也凝聚着人们的艺术观念，也属于观念形态的东西。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但其在发展过程中，与哲学、宗教、艺术、思维方式等关系密切，并逐渐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和思想方法，因此其中也有属于观念形态的内容。此外，社会风尚、生活习惯等，也具有观念形态的因素。

以上我们用简要的话语勾勒了“文化”概念的历史演化，从结构学的角度看，文化结构主要包括三大部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物质文化是人们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是人们为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从事生产劳动创造的物质成果。物质文化包括：生产工具——技艺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居室建筑文化、舟车交通工具文化等。物质文化的特征是可感性，即它是有形的、以器物形态表现的文化。从文化的结构层次看，物质文化处于文化结构的表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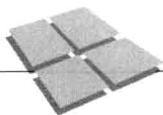
制度文化是人们为处理和解决各种社会矛盾、调整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制订的各种规范、规则、条例、法律等，是以社会制度形式呈现的文化现象。具体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婚姻制度、家族或家庭制度、宗教制度、行帮会制度，等等。它是一种“无形”的文化，但又确实实地存在于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日常活动之中，影响和制约人们的生活，是起劝诫或约束作用的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处于文化结构的中层。

精神文化是人们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社会心理和意识形式。社会心理是指人们非系统化、不定型、处于自发状态的思想意识，具体表现为与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情感、风俗、习惯、信念、思想倾向等。意识形式则是指理论化、系统化、具有较严密的逻辑体系的自觉的思想意识，具体表现为政治、法律、艺术、道德、宗教、哲学、科学等。它们是对社会存在较为间接的反映，是经过提炼加工后形成的思想意识。精神文化，特别是其中为意识形式处于文化结构的深层。精神文化的特征是抽象性和相对独立性，是以观念形态呈现的文化现象，对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起巨大的推动作用。精神文化必然在实践中转化为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三种文化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0。

③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4—695。



用，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总之，文化内容非常丰富，其内涵所蕴甚广，正如现代著名作家老舍所说：“一人群单位，有它的古往今来的精神的与物质的生活方式，假若我们把这方式叫作文化，则教育、伦理，宗教、礼仪，与衣食住行，都在其中，所蕴至广，而且变化万端。”^①据此，我们认为：文化是指代表一定民族特点的，反映某个或几个特定历史阶段政治和经济的状况，具有知识价值的精神成果的总和。它是一个包括哲学、宗教、科技思想、文学、艺术、思维方式、习俗等在内的有机整体。它既是精神层面的观念形态的东西，又具有物质层面、社会生产方式方面所反映出来的观念形态的东西。

二、中国传统文化内涵

由文化的内涵观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既具有文化的一般性特征，更具备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个性。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特点，反映了中国五千年来的社会历史各阶段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它包括了古代哲学、宗教、科技思想、文学、艺术、思维方式、习俗等，并形成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中华民族在其产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民族语言，民族性格，民族精神风貌，民族风俗、习惯，传统礼仪、道德，民族的生活方式，民族所固有的社会关系或血缘关系，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等，都具有鲜明的民族个性。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体现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概括起来大致有四：一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名言，自古迄今传承下来，激励着人们奋发图强，昂扬向上，不断进取，努力拼搏。

二是崇尚气节、正道直行的精神。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把尚气节、重情操作为立身行事的基本原则，特别鄙视那种朝秦暮楚、奴颜婢膝、贪生怕死、变节投敌的行径。这种民族的浩然正气，最初由先秦儒家所推崇，以后逐渐深入到民众的意识之中，从而培育了无数的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在中华大地上一直流传下来的古老格言，比如：“见义勇为”“当仁不让”“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士可杀不可辱”“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等等，这些民族文化的精华，成为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

三是豁达乐观、宽容和平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儒家道家一明一暗两条主线。儒、道两家都是以豁达乐观的态度对待人生、对待未来。儒家采取积极入世的态度，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把艰难、困顿、挫折、屈辱等等作为磨砺自己意志的试金石，即孟子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②道家尽管对人生的态度有某种空想性的因素，但其文化精神中仍蕴含着执着追求、豁达乐观的品格。像庄子所谓：“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郤，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明于心者也。”^③即要求永远保持和悦愉快，与物为春的态度，表现出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宽容博大的特点，其主要表现是文化上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交流。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到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从玄奘天竺取经，到宋明

① 老舍·大地龙蛇·序//老舍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287.

② 孟子·告子下.北京:中华书局,1960:298.

③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德充符.北京:中华书局,1983:157.

理学融儒道为一体，无不表现出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宽容精神。同时，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酷爱和平，如“和为贵”“德不孤必有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古训，即表现了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睦邻友好关系。

四是乡土情谊、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与“土”的关系深厚，不仅崇拜天，而且崇拜地。天地与父母、君王、师长合成“天、地、君、亲、师”，构成中国文化的多种信仰。而这五大崇拜的对象，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地位的神，无疑是“土地”，它与人的距离最近，“土地”的亲切、善良、宽容、慈祥，以及它的生物之功、载物之德，使中国人对它产生景仰之情，这种具有宗教性质的崇拜，落实到文化层面，即是中国人的乡土情谊。

中国文化的乡土情谊，在功能上起着巨大的凝聚作用，使中国人对家乡、对祖国、对民族、对文化都具有普遍的亲和感与认同感。这种乡土情谊可以提升为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从而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中国文学古代诗词中，均有诸多篇章反映出由乡土之情所扩及的爱国之情以及由爱国之情所产生的对故乡、故土、故国、故人的怀念。南宋词人朱敦儒的《采桑子·彭郎矶》可作为其中的代表。其词说：

扁舟去作江南客，旅雁孤云，万里烟尘，回首中原泪满巾。碧山对晚汀洲冷，枫叶芦根，日落波平，愁损辞乡去国人。

可以说，中国文化的乡土情谊经过提升，可以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培养团结共进和互助友爱的精神；另外，它又含有消极的成分，甚至可以造成个人与国家民族的疏离感和山头主义、小团体意识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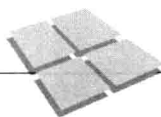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糟粕的部分，比如小农经济的封闭保守思想，封建专制主义、“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封建的纲常礼教：“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道德戒律等，这些都是束缚人们精神的文化负载。

▶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环境

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生、发展的生态环境，主要包括地理环境、经济条件和社会结构，三者相辅相成，组成一个民族相对稳定的文化发展空间。在中国传统文化生成、发展及其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它除了受经济基础、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由此决定的各种各样的生产关系的制约，还受一定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的影响，而且人类社会越接近原始阶段，这种影响力也就越大。

一、地理环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的新石器时期就开始了农业活动。中国早期的农业生产，充分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在仰韶文化区的西安半坡村地窖中，发现成堆的小米，这是目前所知人类最早的谷物栽培纪录。其他遗址如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华县柳子镇泉获村以及山西万泉县荆村等地，也陆续发现小米痕迹。这说明，在仰韶文化区内，小米似乎是当时的主要食物。谷类作物耐旱性较强，至今在我国北方的广大耕作区内仍是主要作物。仰韶文化分布区主要是黄土高原。据地质学家的研究，黄土高原的形成多半是由数十万年来从戈壁吹来的黄沙覆盖而成，其土质结构松软多孔，有较强的渗水性，



遇到雨水，可以像海绵一样对水起保存的作用。水分渗入深处，蒸发缓慢，不仅能长期保存，且能在干旱季节，由地下经毛细管作用渐渐上升，供给作物根部水分的需要。再加上黄土的风化程度较弱，颗粒中所含矿物质不易流失，具有较强的肥力。因此，早期人类能够利用这些特点，在干旱环境下，以耐旱的谷物为食粮。反映了我们先民的聪明和智慧。

和黄土高原仰韶“小米文化”的产生一样，在华东沿海的河姆渡文化遗址、江汉流域新石器文化遗址均发现人工栽培的水稻，这也是目前所知世界人类最早的水稻栽培纪录。河姆渡文化区分布在浙江余姚县周围，它与江汉流域的自然条件比较一致，都有低洼湿热的特点，与这种地理、气候条件相适应，产生了“水稻文化”。

由上可见，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起源，是与黄土区域与江汉流域两种各异的气候地理状况相适应，而分别产生了以小米与水稻为主的不同文化，从而奠定了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基础。

中国的地理环境影响着文化生长、发展。中国拥有极为广袤的疆土，其内部平原广阔，特别是黄河、长江两流域平原毗连，没有明显的天然屏障可以阻隔，因此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上都较海洋诸岛易于统一。中国能对边族潜移默化，始终保持着自己文化的独特风格和完整系统，并使之绵延不绝。

中国有较易于隔离的地理环境。东面临海，西北横贯漫漫沙漠，西南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青藏高原，平均高达四千米至五千米。在生产、技术不发达的古代，这些都可以说是地理上的阻绝地带，给予农业民族无法突破的限制。这种一面临海，其他三面陆路交通极不便利，而内陆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的环境，形成了一种与外部世界半隔绝的状态，使中国没有向外部世界拓展的野心，养成了独自经营、和平温顺的国民性格。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大体上是在本土独自酝酿成长，虽偶有由西域或海上传入外来文化成分，皆能雍容消纳，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稳定而富于自信。

从自然条件看，中国的气候，也影响文明拓展的方向。古代巴比伦、埃及、罗马、印度等文明，都发源于暖温带而逐渐向寒冷地带发展，中国则相反。由于季风气候的影响，我国雨量由东南至西北递减，而地势由东南至西北逐渐增高，多数河流由西向东或由北向南注入大海，再加上南暖北寒的气温，造成南长北短的农作物生长季节，这些条件对农民的垦殖发生吸引，所以形成人口南移、文化南进的趋势。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早在秦汉时期，就拥有六千万人口，而耕地面积却远远不足。再加上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这样不得不使农民在所分得的狭小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对土地作最经济的利用。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条件下，虽然忙碌辛苦，也仅能糊口，这便养成了安土定居、乐天知命、安分守己的民族性格。作为农业民族在经济上形成对土地的依赖，反映到民族心理上则表现为对乡土的无限眷恋和对故国的深厚情怀。

二、中国传统文化植根的经济土壤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建立在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生产的土壤里。中国北起大兴安岭西坡，沿西辽河上游和燕山山脉，斜穿河套，长江上游，直抵雅鲁藏布江河谷，是一条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这条线为界，被划分为温湿的东南和干寒的西北两大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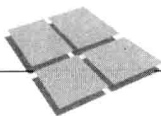
前者面积不足总面积的40%，人口却占绝大多数，数千年来在农业经济发达的前提下，典章制度完备，文明昌盛，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居世界前列。后者除小块绿洲与河谷小平原农业区外，民众多以游牧为主，一般说来，游牧民族的经济文化处于较原始的阶段，文化程度低于农耕民族。农耕民族农业经济发达，距今七八千年的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先民们在长期的实践中最早培植了半干旱性的粟和水稻，开始进入以种植业为基本方式的农耕时代，随之而来的动物驯养为人类提供了可靠的食物来源和财富的积累，为文明的诞生奠定了物质基础。黄河流域是中国最主要的黄土层地区，黄土有利于原始方式的开垦和作物的浅种直播。最早培植的粟，生长期短，有明显的耐旱、抗瘠、滋生力旺等优点，尤其适合当地的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这样就促使黄河中下游地区率先进入文明社会。而长江流域水稻栽培技术要求高，费时耗力，原始的耕作方式扩大生产较困难，剩余产品积累较慢，加上南方自然资源较为丰富，捕捞狩猎采集经济相当发达，容易忽视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致使南方农业生产在相当长时期内停留在比较原始的状态。

原始农业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出现较大规模的村落，由氏族而部落，由部落而部落联盟，社会组织日趋严密，器物制造日趋精细，除陶、石、木、骨、玉器外，金属冶炼也已出现，私有制由萌芽而壮大，部落贫富分化明显，部落联盟战争催化了文明社会的降临。“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中国古代以社稷作为国家的代称，社即土地神，稷为粮食，即代表农业之神。有了土地和农业的发展，即有了国家。商周以农业立国，战国“尽地力之教”，列国重本抑末，奖励耕战，确立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男耕女织的传统模式。

秦汉以来，小农经济进一步发展。后来的各个朝代都把农业立国作为国策。东汉以后，尤其是东晋南渡后，长江中下游渐次得到大规模开发。隋唐时，长江中下游成为京师漕米和布帛等重要供应地。其后中国的农耕区不断扩大，长江上游、长城以外、东北地区、五岭以南农业的支配地位牢不可破。在近代商品经济得到充分发育以前，中国生产方式的主体是农业自然经济。中国文化扎根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土壤，这对民族心理、思维方式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农人注重实际，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中国古代圣哲一向提倡“君子务实”，久而久之使得民族性格成为重实际而黜玄想，从而促成了农学、天文学、医学的发达。

中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农业生产与农人的定居密切相连。农业民族为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起居有定，耕作有时，如果不遇到大灾荒、大战乱，农民很少迁徙，安土定居是他们的普遍心理。农民与外界世界也很少联系，有的世代固守在狭小的范围里，过着半封闭的生活。这种恋土封闭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性，使农民养成了对生活的稳定和安定的追求，求稳怕乱，求安惧险，无以产生强烈的创新和开拓精神。就文化心态而言，文人们所向往和颂扬的多是和平宁静的田园式生活境地，歌颂孝慈仁爱，鞭挞暴虐苛政，反对穷兵黩武。

除农耕经济外，中国广阔的西北地区自古生活着游牧民族，他们以游牧经济为主。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斗争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全过程，而农耕和游牧两种经济类型间的交互关系，是中国众多民族间的关系的一种形式。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一方面时常发生冲突战争；另一方面是民族文化的互补融合。中原先进的生产方式、典章



制度、物质文明，都曾以各种方式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游牧民族产生影响。农耕民族通常以“和亲”、互市、迁徙、通婚、战争等形式为媒介，向游牧民族传播先进的文化信息、生产技艺。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受到了先进文化的熏陶，大多改变了原来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语言服饰，落后的征服者被征服者所同化几乎成为一条不可抗拒的定律。原本对汉官和汉文化十分仇视的石勒在立国(后赵)后督劝农桑，设官专管经学、律学和史学，立太学和四门小学，石勒还亲自到太学考试学生经义。北魏孝文帝更是全面推行汉化措施，颁均田令，行三长令，并改官服，禁胡语，改姓氏，全面革新陈规旧习，使内迁的鲜卑人迅速与汉人同化。曾与中原政权长期对垒或进而入主中原的匈奴、突厥、女真、蒙古等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在与先进的汉族农耕文明的接触过程中，几乎都发生了由较低级社会发展状态向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过渡的历史性飞跃。

三、中国传统文化依赖的社会政治结构

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结构的特点是“家国同构”。这种由带有某种血缘温情的宗法制度和与中国一脉相承的专制制度相结合的社会政治结构，深刻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其影响深入到包括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史学文学艺术、民风民俗，甚至科学技术等等领域里。

阶级产生以前，人类走着大体相同的道路，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组织形式。先是原始群居，以后是氏族，继而发展为部落。但在阶级和国家产生后，由于自然环境和各地居民生活方式的不同，血缘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表现形态出现重大差异。地中海沿岸国家，特别是古希腊，人们生活在多岛的海洋型地理环境中，很早就从事海上的工商业贸易活动。这种流动性很强的生活方式，强力地冲淡了蒙昧时代的血缘关系，形成了以地域和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城邦社会。与地中海沿岸国家不同，中华民族是在一块广袤的大陆上独立发展起来的，其自然环境、生产方式都和古希腊有很大的不同。中华民族栖息的这块东亚大陆，地形、地貌复杂，气候适宜，有无数河流、湖泊，有高山峻岭，有一望无际的平原，面积之大，以至于在先民的眼里，中国就是天下。但是他们的活动范围却相当狭小，很早就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定居农业生活。与世隔绝、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即使从野蛮转换到文明阶段以后，亦无法冲破人类原有的血缘关系，血缘家族的社会组织形式被长期保留下来。

当然，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与文明时代的血缘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原始民主制的基础，而后者则是阶级专制的基础。从现存文献和地下发掘材料看，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产生于商代后期。根据《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武王克商后，周王室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丑类，以法则周公”。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崎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分康叔以“怀姓九宗”。这里所说的氏、族、宗就是宗族存在的证明。西周建立以后，统治者在商代宗族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体系完整、等级严格的宗法制度。西周灭亡后，以姬姓贵族血缘纽带关系而联成的统治体系瓦解，秦汉时，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官吏选拔以“贤贤”取代“亲亲”，军功、荐举、考试直至科举盛行，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世卿世禄制，但帝王继续仍由皇族血缘确定，嫡长子继

位长期延续，宗法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发展。同时，秦汉以后，历朝历代均以中央集权强化君主专制，这样就形成了以宗法制关系的专制形态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社会政治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依赖的主体。

首先，社会结构的宗法型特征，导致中国文化形成伦理型模式。这种模式的形成给社会的发展带来的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其正面影响表现为：

一是具有浓烈的“孝亲”情感。这种情感不仅体现为对死去先祖的隆重祭奠，而且更体现在对活着的长辈的绝对顺从、孝敬。“百善孝为先”，在中国文化系统内，孝道被视为一切道德规范的核心和母体，忠君、敬长、从兄、尊上等等都是孝道的延伸。

二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中华民族赖以统一、独立和生存、发展的内在动力。它是由多种要素、多种条件有机构成的合力，是一个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而形成发展，具有自身特征和多方面功能的动态系统。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内部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自然因素；另一个是社会因素。自然因素主要指血缘、地缘关系，这种因素在民族凝聚力生成时期所起的作用是比较大的。其社会因素包括：先进、发达的物质经济，进步、成熟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制度，优秀、丰富的思想文化。

三是对传统的极端尊重。学者、思想家讲究学说的承传性，文人墨客则推荐“文统”“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成为千古不绝的文学史主题。艺术流派和工艺行帮更讲究“家法”“祖传秘方”更是医家取信患者的法宝。即使是那些对现状不满的政治改革家，也往往要借“托古”来推行“改制”，否则便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民众的拥护。这种对传统的极端尊重，使得中国文化形成世界罕见的未曾中断的文化系统，大大强化了中国文化的延续力。

四是宗法伦理观念及其理论形态构成中华文化意识形态系统的核心。在中国，伦理学当仁不让地成为社会首屈一指的文化门类。反映于学术文化领域，便是道德论、宇宙论、认识论互摄互涵混淆不清。在宗法血缘纽带解体较早的希腊、罗马，社会秩序更多地仰仗契约、法律维系，人们关注的中心不是人际伦常关系，而是以更大的兴趣去探索大自然和人类思维的奥秘。从古希腊到近代西方，以“求真”为目标，道德论、宇宙论、认识论各自独立发展，虽然联系，但绝不混同。古代中国则不同，一切学问均与“求善”的道德伦理目标相沟通，而客观的外在事物，尤其是有关自然现象、规律，很少被作为独立的认识对象与人伦相分离，科学因而遭到压抑、限制。在这种文化氛围内，自然科学、思辨哲学都难以获得充分发展，而伦理学却滋生扩张。其他一些学科门类往往以伦理学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哲学讲阴阳之道；文学强调“教化”功能；史学则“寓褒贬，别善恶”；教育则“首孝悌，次见闻”；政治学说也成为伦理观念的引申，政事被归结为善恶之别、正邪之争；传统学术更是重人事轻自然，连地震、陨石等自然现象也被解释为上天对人间恶行的惩罚。可见中国文化从这一角度讲实质上是“德性文化”，与西方“智性文化”比，西方人崇尚法治，而中国人则崇尚德治，道德的威力始终被看得比法律更有效，统治者极力强化用三纲五常等伦理训条来对人民的精神行为进行规范。以此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所谓“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五常”方面的配合，便构成社会特殊的充满人伦感情的和谐秩序。

当然，伦理型模式的负面影响也是相当大的，三纲五常的绝理说教，“存理灭欲”的修身养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盲目排外心理等，成为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障碍。

其次，中国社会结构的专制性特征，导致中国文化形成政治型模式。

这种模式给社会带来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一是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大一统思想是我国儒家所倡导的，植根于中华民族心理的重要思想观念，是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体现。大一统思想有两层含义：第一，强调国家的统一；第二，与国家统一相适应的是强调加强中央政府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控制能力。

面对春秋末年的群雄割据、分崩离析、兵连祸接的混乱局面，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力图找出挽救时局的政治药方，“大一统”思想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第一个大力倡导“大一统”思想的人是孔子，他曾称赞管仲辅助齐桓公“一匡天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尽管各家主张大相径庭，但在建立统一国家这一点上却是基本一致的。儒家主张用“仁政”来实现“大一统”；法家主张用“法治”来统一天下；墨家则强调“非攻”“兼爱”来实现统一，方法虽有不同，但建立统一国家的目标却是一致的。

秦国的商鞅变法使秦国获得了“天下定于一”的基本条件，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汉唐时期，特别是汉初董仲舒对儒家统一理论的继承和阐发以及汉武帝政治上“汉承秦制”、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大一统的思想发展成为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了各族人民的共识，并转化为全国各阶层的心理定式。

二是导致国人严重的服从心态，迷信权威、权力。在君主专制统治下，文化不得不讨好专制，为君主专制提供理论依据。秦汉以后，专制政治理论不断发展：西汉董仲舒提出“君权神授”论，还创造出阴阳“三纲”理论，其中排在首位的一纲就是“君为臣纲”，将神权、君权、父权三者合一，君主专制越发神圣不可动摇；宋代文化人程颢、程颐、朱熹，又使君主专制主义理学化。他们明言“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宋明以后，在其文化理论的渲染下，君主专制越发惨烈。由于长期专制政治的压抑和高度发达的专制文化的熏陶，社会对于凌驾于自身之上的绝对君权，形成一种莫名的顺从、敬畏心理。人们习惯于把帝王的“圣旨”看作无可怀疑，必须无条件执行的“绝对意志”。

这种忠君顺上的价值取向，造就了中华民族的双重性格。一方面，忠君与爱国融为一体。在民族矛盾冲突之际，一些志士仁人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决不事异族，事二主，背叛祖国，产生了一大批爱国之士。有宁死不屈的文天祥，精忠报国的岳飞，视死如归的邓世昌等等。顺上的心态，与祖先崇拜相互表里，造成了中华民族尊老、讲究孝道的社会风尚，对社会和政治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这种价值取向也造就了中华民族性格的负面影响。在家庭里表现为子女没有行动自由，一切以长辈的意志为意志，以长辈的是非为是非；在社会上，人们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习惯奉命行事。愚忠的畸形道德又进一步扭曲了人性，因而在国民中产生了诸如权势崇拜、敬畏官长、遇事退缩、世故自私、不敢讲真话等消极的阴暗性格。

三是导致文化人入世的人生态度，经世的社会抱负自觉地服从君主专制政治对其的笼络利用、恫吓镇压。中国古代的文化人素以治国平天下为自己学术事业与人生价

值的最高目标。他们拥有学问、知识，必须而且只能依附于政治才能达到目的和实现其价值。因此，由学而仕，投身宦海，成为文化人普遍的自我角色认同。

这种心态正与专制政治的意识形态和政权建设的需要相契合。宗法与专制的结合，在政治上表现为儒法合流，在文化上的反映则是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突出地表现为“内圣外王”的心态，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追求。这一特点，在先秦时期已经形成，以后经过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形式上虽多有变化，但这一传统一直被延续下来。中国文化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范式，从“内圣外王”的矛盾统一体中获得了坚忍的理论架构，并以小农自然经济和宗法专制的社会政治结构作为坚实基础，组合成一个严密体系。这个严密体系，只有在近代大工业兴起之后，才逐渐瓦解，新时代的新文化才有可能形成。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流演进

中国传统文化从萌芽产生、发展成成熟直至“现代化”的转化，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即远古时代的原始文化阶段，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萌发期（远古至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期；秦汉至宋明时代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成熟期；明末清初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转化期。下面即分四个阶段加以叙述。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萌发期（远古至西周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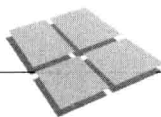
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是原始社会的原始人创造的原始文化。原始人不仅在劳动中创造了语言，而且通过长期的生产实践，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知识，提高了技能，增长了才智，不断有所创造发明。于是，创造了文字，出现了陶塑、绘画、雕刻、音乐和舞蹈。根据现代考古的重大发现，中国古代史前存在着三大民族集团，即河洛民族（华夏集团）、海岱民族（东夷集团）和江汉民族（苗蛮集团）。

河洛文化区，位于黄河中上游。仰韶文化、裴李岗文化、陕西、河南龙山文化是其代表。始祖为烈氏，后来的部落氏族领袖炎帝（即神农氏）和轩辕黄帝联盟，产生了族外婚的婚姻形式，繁衍出世代的炎黄子孙。会种谷物、蔬菜，懂得纺织，会烧制陶器，距今6000~8000年。

海岱文化区，位于黄河下游、黄淮之间的广大地区。这里居住着夷人各部，最早见于史书的是伏羲氏为“九夷”部落联盟首领，始作八卦，教会人们渔猎。大汶口文化是其代表。后来其部落联盟首领蚩尤被黄帝打败，并入华夏族，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江汉文化区，位于长江中下游，是古苗蛮族各部落居住地。《史记》：“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最早培育出水稻，距今已7000年，湖北屈家岭文化、浙江河姆渡文化是其代表。陶器以黑陶、灰陶为主。孕育了其后的楚文化。

三大文化区在以后的交流发展中逐步融合，共同创造了史前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其农业、牧业、手工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出现了早期的文字等。我国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建立了夏朝，开始从氏族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而从商代（约公元前16世纪至前12世纪）、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至前770年）将近九百年中，奴隶制得到了高度发



展。这一阶段，社会生产和文化日益繁荣，科学技术也得到了进步，在天文、历数、医药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作为原始文化的观念文化，主要表现在三大文化区的原始部落人的认识和思维方式上面，早期人类认识和思维方式的重要形式是原始宗教崇拜，巫术思维和神话思维。

中华先民的原始宗教崇拜大致可分为自然崇拜、生殖——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三大类。对大自然的崇拜(大地、太阳)是先民最原始的崇拜形式之一，在一些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可发现表现太阳图形的纹饰；在一些新石器时代的岩画上，也清晰地出现了太阳神的形象。民间长久流传的“地母之说”以及古文献中“郊祀社稷，由来久矣”的记载，也透露了先民土地崇拜的踪迹。对生殖——祖先崇拜，是由于中华先民非常关注自身的繁衍和崇敬创造生命的祖先所产生的。如在一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上发掘出来的高腹丰臀、乳房硕大的陶塑女神像、男性生殖崇拜物——石祖、陶祖及大型生殖崇拜岩画等，都展示了人们对生命崇拜的庄严情感。对祖先的崇拜表现在母系氏族社会，主要是供奉女性祖先，随着父系社会的到来，男性祖先日渐成为供奉对象。祖先崇拜往往有严格的仪式，在这些仪式中，中华先民虔诚地寄托对祖先创造生命的崇拜。

与自然崇拜和生殖——祖先崇拜相比，图腾崇拜是较为高级的宗教形式。“图腾”是美洲印第安人奥基华斯部落的语言。由于在原始思维中，类比和联想是主要方法，原始人一般都相信自己的氏族与某种动物、植物或非生物之间有一种特殊的亲密联系，并以之作为氏族崇拜的对象，这就是“图腾”。考古发掘和神话传说中，有丰富的图腾崇拜资料。相传黄帝率熊、罴、貔、貅、豹、虎六兽同炎帝殊死搏斗，这六兽其实是指以其为各自图腾的六个氏族。鱼、鸟、蛙、龟、蛇、猪、马等实有自然物以及人们运用抽象的、概括的思维能力创造出来的对象，如龙、凤等都曾是中华先民崇拜并奉为本族徽帜的图腾。

对于后世文明意识来说，原始宗教无疑充满了种种神秘色彩。然而，在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处于低下水平的原始时代，它具有在人与自然之间起协调作用，在本能与文化之间起制约作用，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起补充作用，在人的精神需要中起主导作用等文化功能上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正因为如此，原始宗教才能成为原始时代观念文化的主流。

巫术也属于原始宗教范围，巫术思维水平略高于图腾思维。“巫”《说文》说：“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①与某种无形中的神灵相交通，相应的其思维特点就明显具有间接性和幻想性。巫术尽管是迷信的产物，但是却又与早期的科学知识相联系。《山海经·大荒西经》上的诸巫或“操不死之药”，或“百药爰在”；《周礼》把“掌养疾马而乘治之，相医而药攻马疾”的马医叫“巫马”；古代的“医”字也从巫而写作“醫”，表明在当时科学与迷信是密不可分的。巫术的基本目的无非是：保障安全、免灾祛病、丰衣足食、多子多孙等，其方式有祈求式、诅咒式、占卜式等。在原始宗教初期，还没有专门的巫师，也没有专门的祭司，仪式通常由部落中的长老主持。后来，随着宗教的进一步专业化、精致化，分化出一批专门人员，由他们负责与神秘的超自然界的

^① 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100。